学海星光

毛泽东与统一战线

夏海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1950年，毛泽东在听取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汇报时，明确“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我们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所谓统一战线，既有广义的理解，又有狭义的理解。广义是指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这是古今中外任何成功政治实践必须遵守的通则。狭义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主要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恩格斯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概念，“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不来梅通讯》）。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思想。在领导制定《工人统一战线的纲领》时，“要求一切共产主义的政党都要严格遵循统一战线的策略，因为现时只有这个策略才能够向共产主义者提出争取劳动人民大多数的正确途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完善的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是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存在着矛盾的特殊性，“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矛盾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

是不同质的”。对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社会实践中，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斗争的办法解决，而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可以用统一战线的办法解决。

是因为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复杂的事物，“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一般而言，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而次要矛盾既有对抗性又有同一性，为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能够互相转化的，“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建立统一战线，则有可能使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

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现实依据是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人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人类社会分为上、中、下三类不同人群，“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区分为左、中、右三类不同人群，“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无论上、中、下还是左、中、右，毛泽东都是为了分清敌、我、友，以利于建立统一战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敌人，当然要进行坚决斗争，而对于朋友，则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一步一步地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反帝反封建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么，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毫无疑义，主要的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同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实质是要争取中间势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争取中间势力，既壮大自己又削弱敌人。在特殊条件下，甚至可以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变化，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内涵也在变化之中。大革命时期，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国共统一战线，形成了由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背叛，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既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又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非劳动者联盟。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中国共产党就要“联合工农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仍然要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或称之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应当指出，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基本目的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孤立敌人，就是要削弱敌人，把敌人缩小到最小的范围；不孤立自己，就是要壮大自己，把朋友的范围扩大到最大的边界，“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为了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策策略，“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即使对于敌人，也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对于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统一战线不能只有联合和团结，没有批评和斗争，“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一条真理。统一战线内部的联合和斗争，就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进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不断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人物掠影

都海江：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故曲传情，知音相惜。9月20日，故宫博物院与安徽演艺集团战略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在签订仪式现场，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都海江表示，京剧艺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之一，已有两百余年历史，对北京这座文明古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大徽班进京，在清代宫廷之中，每逢节庆宴饮时，便会奏乐演剧，唱腔悠扬委婉，表演形神兼备，声情并茂，韵味醇厚，滋养着玉楼金殿，宫廷文化也重塑了京剧规范，使得京剧表演臻于完善，创造出如《将相和》《定军山》等一部部艺术经典。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都海江认为，作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与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绚烂文化与不朽的人文精神，蕴含着人类文明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新时代的召唤下，双方将携手并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绚烂篇章。

故宫博物院拥有186万余件文物藏品，在清宫戏曲文物，包括戏本、戏画、戏台、戏衣、道具、档案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收藏和保护机制。这些文物是清宫演剧活动的珍贵实物遗存，对于传统戏曲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都海江说，近年来，故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对故宫及其珍藏文物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推动发挥故宫博物院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记者 杨雪）

傅若清：推动中国电影更好走向世界

日前，2023年北京文化论坛“文明互鉴：相互尊重与合作发展”平行论坛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参加并作主旨发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他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代中国能否被世界所了解、所认知、所接纳的重要途径，也是凝聚发展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与落脚点。如何凝练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全面、立体、生动的“今日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傅若清以今年春节期间中影主导出品的电影《流浪地球2》为例表示，影片中壮丽的硬科幻重工业美学，同中国现实中诸多的“大国重器”、超级工程相呼应，不仅激发出文化自信的深沉力量，更是令世界观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充满期待。“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电影为媒介，共享人类文明丰盈和谐之美；以科技为纽带，链接高新电影技术发展，拓展视听艺术应用的边界；以交流为桥梁，推动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出去”，让电影成为中华文明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抹亮色。”傅若清表示，电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精神的映射，只有与更多观众的认知情感相契合，才能获得更广泛、更长久的生命力。为此需要贴近生活、扎根现实、聚焦热点，寻找能够反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人物故事，把更多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搬上大银幕。

（记者 张丽）

韩敬群：用耐心打磨好作品

近日，作为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数字时代的文学生活——“奔跑在数字时代”网络征文大赛论坛在十月文学院举行。多位嘉宾围绕“数字时代的文学生活”探讨互联网时代文学书写的方式和力量，助力写作者留下属于这个数字时代的脚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示，文学在这个时代需要故事，而故事作为生活的基本构成，无时无刻不在人们身边发生。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数字时代或前数字时代，虚构的文学写作者怎样找到这个时代的好故事，怎样把这些故事写好，这是我们更要关心的问题。

韩敬群举例，我们都生活在北京，过去在这里曾经涌现出非常多书写北京故事的优秀之作，今天，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怎么去书写北京？在他看来，生活在一个城市，就会带有这个城市所赋予的特殊气质，北京文学要体现的是这个城市的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作家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生存起伏，一定是与这个城市的脉搏连在一起的。

谈及“奔跑在数字时代”，韩敬群坦言，生活不仅需要奔跑，也许可以少一点奔跑，多一点溜达。写作也是一样，写作不是奔跑，写作需要耐心，用足够的耐心打磨一部立得住的好作品。

（记者 谢颖）

人生撷英

用镜头讲述真实的新疆故事

——访纪录片导演库尔班江·赛买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马嘉悦

编者按：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拥有无数的自然奇观，有秀美无比的天山天池、无尽的戈壁沙漠、辽阔壮丽的草原、白雪皑皑的群山，每一处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想要展示新疆多元、立体、可爱的形象。”作为一名导演，库尔班江·赛买提拍摄了《我从新疆来》《我到新疆去》《新疆滋味》等反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纪录片，用民间视角讲述了普通新疆人在其他城市生活奋斗的故事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热爱新疆的人们在新疆创业和生活的温情故事，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新疆。近日，人民政协报融媒体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目前，您正在拍摄《我到新疆去》第二部，这部纪录片有何特别之处？

库尔班江·赛买提：《我到新疆去》第二部的主题是“圆梦新疆”，将延续此前的风格，从新疆14个地州市中拍摄来自各行各业的42位人物，还原、记录、展示新疆快速发展背后默默耕耘、坚强拼搏的鲜活人物故事。

相较于第一部，第二部的人物故事将更具有时代感，更着力描写新疆的经济环境变化与独特的文旅资源，更与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产生关联，融入更现代化的元素，引入电影水准的真实再现。同时，将以更大的篇幅与体量拍摄更多、更多元的人物故事去呈现一个立体、多元、可爱的新疆形象。

记者：您用10年时间拍了3部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我到新疆去》《新疆滋味》，拍摄新疆系列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

库尔班江·赛买提：我从新疆走出来后，发现许多人对新疆的多元民族构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了解，只停留在“瓜果”“沙漠戈壁”“能歌善舞”等表面印象，于是萌生出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新疆的想法，让大家了解真正的新疆、了解真实的新疆。

经过思考，我觉得讲好新疆人的故事，就讲好了新疆的故事。于是，2013年开始，我走访了20多个城市，采访了500多名在异乡生活工作的新疆人，他们中有律师、演员、医生，有和田玉商人、刚到内地工作的厨师，还有做了50多年维吾尔族音乐的汉族人……最终选择了100名主人公的故事汇集成书《我从新疆来》。相比书籍，拍摄纪录片一直是我的梦想，因为纪录片可以更加灵活、真实、丰富地讲述故事。经过打磨，我选择了18位新疆人作为主人公，拍摄了《我从新疆来》这部纪录片，用影像的形式记录着新疆人异地奋斗的故事。

《我到新疆去》这部纪录片与《我从新疆来》的视角完全不同，拍摄的主人公是24位憧憬、热爱新疆的内地人和外国人。他们每个人去新疆的目的不同，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这片土地付出努力，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情感印记。比如，东北的文物修复师徐东良，为了保护民族艺术，长年埋头在吐鲁番的石窟里描摹壁画；重庆的琵琶演奏家王劲梅，被新疆的木卡姆吸引来到新疆，又在这里培育了一批新疆琵琶演奏家。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在新疆的交汇与碰撞，也可以看到中国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图景。

《新疆滋味》这部纪录片则是从新疆美食入手，通过新疆物产、美食文化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我觉得，美食是最能体现新疆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因为全国各地所有的菜在新疆几乎都能找到，而且是与当地融合的版本。

我希望通过这些纪录片，可以让大家更加深入、客观地了解新疆，不要“标签化”地认识新疆，消除偏见、误解，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记者：您认为这部纪录片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一家亲发挥了哪些作用？

库尔班江·赛买提：有一次，我在高校作演讲，有位同学告诉我，他在初中时看了《我从新疆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规划。在他曾经的认知里，职业只有医生、警察、公务员这几种，看了《我从新疆来》以后，他才发现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职业，每个职业都能找到新疆人的身影。只要努力，就会有很多选择。

大家观看纪录片会发现：虽然大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饮食习惯甚至外貌，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们都在为生活努力、为家人奋斗、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记者：请您讲一讲在拍摄纪录片期间，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库尔班江·赛买提：在拍摄关于唐季礼的纪录片时，我问他，对新疆的最初印象是什么？他回答，其实很小就对新疆有所了解，但是当时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非常壮观的风景这一层面。去年，唐季礼在为自己的电影挑选拍摄地时，选择了新疆昭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电影，向观众展现一个真实的、多元的新疆。他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应该被全世界看到。我能感受到他对新疆的热爱，这种热爱也深深触动了我。

记者：您曾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在此期间，您是如何讲好新疆故事的？

库尔班江·赛买提：政协委员履职期间，我曾提出不仅要讲好新疆故事，还要做好海外统战工作。作为政协委员，我所能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来履行责任和担当。

于是，我花了3年时间走访了近30个国家，采访了200多位身在异国他乡的新疆人，并将他们的故事汇成了《我从中国来：海外新疆人》这本书。通过他们的故事讲述了新疆人在世界各地的贡献和力量，

他们不仅是新疆人，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世界舞台散发独特的光彩。

记者：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您个人有什么计划？

库尔班江·赛买提：我国的56个民族像56朵花，这些花朵汇聚在一起，体现出我国多元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是要把彼此间的距离拉大，而是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就像调色板一样，颜色越多，画面越绚丽。下一步，我将继续用镜头去展示新疆的多元文化，展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过去10年，我的身份是“我从新疆来”，我在北京生活了整整18年。未来，我要变成“我到新疆去”。我计划在3年内，与300位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到新疆去、为新疆发展作贡献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访谈，通过他们的经历，讲述在新疆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呈现新疆的发展，呈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现状。

孙承健：一部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戏曲电影

9月19日，京剧电影《安国夫人》在全国公映。影片通过描述宋朝安国夫人梁红玉平内乱、抗金兵的故事，表现梁红玉及朱胜非、韩世忠等人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在京剧电影《安国夫人》首映礼暨专家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孙承健表示，该片将当下先进的LED数字虚拟技术应用于京剧电影摄制，创造性地将传统京剧舞台艺术与现代数字电影艺术相融合，是具有标识性的，从胶片时代的《定军山》到数字技术时代《安国夫人》，标志着中国电影再次以戏曲电影形式完成了迭代发展的转换，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孙承健致力于电影数字技术方面的研究，他认为，数字技术是电影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意义上说，戏曲与电影的结合，既不能完全属于电影也不能完全属于戏曲，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大于二，它是属于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华文化自身独有的艺术门类。在表现形式上，其对戏曲美学与电影美学的综合运用，比如在保留戏曲艺术本身特质、运用电影化的语言、电影化叙事处理等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文本介入方面，此片很好地将中国人对戏曲写意、程式等特征的理解，以及对所要表达的主旨内涵通过演员彰显出来。总之，这是一部值得细细欣赏的好作品。

（记者 郭海瑾）